

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的定位与演变规律

贺 群

(西北民族大学 维吾尔语言文学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30)

〔摘 要〕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后会产生同化、借用、融合和双语现象,这是语言兼用、转用、混合、竞争的结果。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后总体演变方向是趋同,它接触的结果受语言功能的层级性影响——强势语言决定弱势语言。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产生的变异是由浅入深发展的,从局部变异开始,发展成系统变异,再由系统变异转变为语言混合。

〔关键词〕突厥语族 语言接触 演变

〔中图分类号〕H2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2)02-0105-06

19世纪30年代,特鲁别茨科依对“谱系树”理论的“同构”和“对应”提出质疑,语言接触研究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研究语言演变的重要依据。20世纪后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研究成为语言学家尤其是历史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密歇根大学语言系教授托马斯森的研究成果最为引人注目,她提出语言接触引发演变的理论框架,使语言接触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语言接触是人类语言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现象,既用来研究语言亲属关系,也用来探讨民族接触所引起的语言变化,是研究语言演变的重要途径,也是研究人类文化演变过程的一种方法。

通过分析一些语言个案,我们发现语言接触可以出现在不同系属的语言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临近地区的亲属语言之间,这两种接触各有其特点,它对我们研究语言接触后引发的语言演变现象及规律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观察和分析新疆突厥语族诸语言间的接触来探讨亲属语言接触后的定位和演变规律。

一、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概况

目前世界上操现代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主要分布于亚欧大陆的二十多个国家里,共有三十多个民族,三十多种语言。我国有8种语言,它们主要分布在新疆、青海、甘肃3省,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兹别克语、塔塔尔语、图瓦语、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除西部裕固语分布在甘肃省外,其他突厥语族语言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维吾尔语是新疆维吾尔族通用的语言,使用人数在新疆各少数民族中最多。维吾尔族绝大部分人口集中聚居在南部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绿洲上,其余人口相对集中聚居在伊犁、吐鲁番、哈密、乌鲁木齐等地,少数分别居住在湖南省桃源县与河南淅川县。在新疆,除了维吾尔族使用维吾尔语外,还有部分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汉族等民族兼通或使用维吾尔语。

哈萨克语是哈萨克族通用的语言,使用人口居新疆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的第二位。我国的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尔泰3个地区,少数聚居在巴里坤、木垒和乌鲁木齐县以及甘肃

〔收稿日期〕2011-12-05

〔作者简介〕贺群(1970—),女,新疆乌鲁木齐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

省阿克塞县。在新疆,除了哈萨克族使用哈萨克语外,还有部分柯尔克孜、塔塔尔族、图瓦、维吾尔族、汉族等民族兼通或使用哈萨克语。

柯尔克孜语是柯尔克孜族通用的语言,柯尔克孜语即吉尔吉斯语。我国的柯尔克孜族主要分布在新疆南部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境内,其余部分散居住在南疆的喀什、塔什库尔干、皮山、和田以及北疆的额敏、特克斯、昭苏等地。东北黑龙江省富裕县柯尔克孜族人讲的语言与新疆柯尔克孜语不同,保留了哈卡斯语的成分。新疆的柯尔克孜人除使用柯尔克孜语外,大多兼通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部分杂居的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也兼通或使用柯尔克孜语。

乌孜别克语是乌孜别克族通用的语言。我国的乌孜别克族主要散居在新疆天山南北各地,多聚居在伊宁、喀什、叶城、莎车、木垒、奇台、吉木萨尔、乌鲁木齐等较大的城镇。乌孜别克人与当地维吾尔人杂居,因此兼通维吾尔语,一般使用维吾尔语言文字。部分杂居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也兼通乌孜别克语。

塔塔尔语是塔塔尔族使用的语言。我国的塔塔尔族分散聚居在新疆乌鲁木齐、塔城、伊宁、奇台、阿勒泰等城镇,目前塔塔尔语只局限于家庭成员使用,塔塔尔族使用的主要社会交际用语为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

撒拉语是撒拉族通用的语言。撒拉族主要集中居住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甘肃省积石山县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的萨木圩孜乡,少数散居在青海省化隆县和西宁市。目前撒拉族大多与汉族杂居,主要社会交际用语为汉语。

图瓦语是图瓦族通用的语言。我国图瓦族主要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尔泰的哈巴河县的阿克哈巴、布尔津县的哈纳斯、库木等地,有少数人散居在富蕴县的铁买克乡和阿尔泰县的阿拉哈克乡和康布铁堡乡,使用的主要社会交际语是哈萨克语。我国图瓦人有很多人进入了蒙古语学校,同时使用蒙古文字。

从语言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功能出发,语言可以分成不同的层级。威望较高的语言属于高层级,威望较低的语言属低层级。高层级的语言在同一个言语社团中用于较正式、庄重的场合,同时有可能成为不同言语社团的通用语言。洪勇明分析了新疆语言状况,他认为,“在新疆语言集团中,汉语作为国家共同语,处于顶层,维吾尔语作为自治区的通用语言,处于高层,其他民族语言的位置相对较低,姑且算做低层语言。如伊宁市的双语场层次就是:汉语处于共同语的地位,维吾尔语是区域性语言,哈萨克语是亚区域性语言。”^[1]

维吾尔语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通用语言,也是我国地理上使用范围最广的突厥语族语言,处于语言的高层,它通行于新疆的大部分地区,被各民族广泛使用,其他突厥语族语言则是亚区域性语言。哈萨克语在这些亚区域性语言中使用范围仅次于维吾尔语,使用人口位居第二,较为明显的语言接触现象常常发生在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之间。新疆的哈萨克族主要聚居在伊犁、木垒和巴里坤哈萨克族自治州县。这些自治州县除哈萨克族外,伊犁地区还有汉、维吾尔、回、蒙古、锡伯等 47 个民族成份,巴里坤居住着汉、蒙古、维吾尔、回、满、东乡、土家、撒拉、藏、壮、俄罗斯等 16 个民族,木垒有汉、哈萨克、维吾尔、乌孜别克、回等 13 个民族。这些地方是典型的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交汇地,语言的互借互用现象随处可见。当地居民常常掌握多种语言,语言接触在所难免。刘宏宇对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语言使用情况展开了比较研究,他发现“锡伯族在西迁新疆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与周围的哈萨克、维吾尔、汉等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建设自己的家园,在与这些民族长期友好接触中,锡伯人往往通晓两到三种民族的语言。”^[2]这一研究成果进一步证明了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存在的普遍性与广泛性。

二、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研究

突厥语族诸语言在历史上就与世界各系属语言有过深入而广泛的接触。早在 11 世纪,突厥语文学家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典》中就有多处提及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问题,其序言中就指出,最清晰、最正确的语言是只懂一种语言而没有与波斯人接触、也没有与外国人来往的人的语言,而会两种语言的、与城里人接触过的人,语言混杂。

前苏联学者 K·M·穆沙耶夫分析了突厥语和世界其他语言的接触,他认为“可以划分出与突厥语发生

接触的语言的一定类型,该类型是以下列特征上的共同性(相似性)为标准的:1.存在共同词汇单位;2.存在共同语素(大部分是构词的,构形的较少);3.存在共同特殊的语音现象(词中的元音和谐律、词中或在词里的一定位置不允许有元音丛、抽音丛等);4.存在共同的语法结构类型(一般是粘着型的)。这些类型是:

1. 突厥、蒙古、满一通古斯语,其特征是具有所有上述现象的共同性。它们构成第一种类型,表现出接触的最高层次。

2. 突厥语和芬兰—乌戈尔语,其特征是有上述现象的共同性,可是这些共同性表现得明显比第一种类型要弱,大部分具有局部的性质。

3. 第三种类型是突厥语和世界其他所有语言的接触,这种类型中共同词汇的存在表现得较前两种类型更弱,虽然在20世纪苏联突厥语和俄语间的共同词汇有显著的增加。共同语素的存在不超出单个土语、方言或语言的范围,缺乏或较弱地表现着上述共同的语音现象,形态结构亦有区别(粘着一屈折、粘着一无形态)。”^[3]在我们看来,新疆突厥语族诸语言接触属于第一种类型,是最高层次的接触。

近年新疆语言接触与影响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课题,学者们被新疆丰富的语言资源吸引,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前苏联学者K·M·穆沙耶夫的《突厥语和世界其它语言接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突厥语和世界语言接触的状况,对新疆语言接触问题有所涉猎。王远新的《突厥语学界语言影响与语言关系研究综述》、陈宗振的《中国现代突厥语族语言研究概况》等论文总结了新疆突厥语族诸语言的研究概况,着重分析了借词、语言接触和影响等问题。牛汝极的《西域语言接触概说》、洪勇明《论语言影响的若干规律——以新疆语言接触为例》、王希杰的《语言接触和语言的演变及其规律——兼评〈新疆的语言状况及推广普通话方略研究〉》等文章从不同侧面探索了新疆语言接触的历史、规律和影响。另一些学者则独辟蹊径,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着力探索突厥语族诸语言间的异同。如程适良的《哈萨克语与乌孜别克语音位比较研究》、侯尔瑞的《雅库特语与柯尔克孜语、维吾尔语音比较》、尤丽吐丝的《哈萨克语与柯尔克孜元音系统对比研究》、吴宏伟的《哈萨克语维吾尔语音位的比较——兼谈两种语言音位系统的发展》等论文虽然没有直接论及语言接触问题,但字里行间却透射着对突厥语族诸语言演变和发展的关注。黄中祥的系列论文《额敏县哈萨克语的地方特色》、《塔城地区哈萨克语探析》和《乌苏县哈萨克语的特点》归纳了三个地区哈萨克语变异情况,指出塔城地区哈萨克语中有一定数量的维吾尔语、俄语、汉语、塔塔尔语借词,证明了语言接触现象的存在。艾尔肯·肉孜已经清晰地意识到了语言接触对语言变异的影响,他在《现代维吾尔语阿图什方言研究》一文中也明确表示,“阿图什方言的元音[ɛ]的发音部位和文学语言的不一样,[ɛ]在阿图什方言中变为[e],阿图什方言的这种语音变化很可能是受到柯尔克孜语的影响。”^[4]无独有偶,安成山在他的《哈萨克语对锡伯语的影响》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哈萨克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里生活的锡伯族人,其生活习俗、语言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哈萨克民族的影响,并反映在当地锡伯族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说哈语的锡族人,他们说锡语时,易将锡语与哈语中相近的元音音位相混淆,说出哈语调的锡语来。”^[5]李树辉的论文《维吾尔语独特语音现象成因探析》则进一步探讨了语言接触对维吾尔语的影响,文章论述了维吾尔语“h音化”、“舌尖颤音的卷舌音化或舌叶浊擦音化”“唏音化”“元音弱化”“两元音间的辅音重叠”“语音换位”等特点,他认为“这些独特语音现象均是受塔里木盆地土著印欧居民在语言转用过程中赋予转用语言的特点,是古代突厥—回鹘语在印欧语系‘底层’语言的影响下演变发展的结果。”^[6]王希杰则从理论上概括了影响语言发展演变的两个因素,他认为“丰富发达的语言的发展和演变,往往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语言自身和它的社会文化因素;二是其他语言的影响。”^[7]在他看来其他语言的影响是语言演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同时也是语言发展演变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新疆是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多语言的交汇地,各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这使得新疆各民族语言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各种语言在并存中接触、竞争、融合。新疆语言接触是广泛而复杂的,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分化,有统一,有互相影响。事实证明,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那些有近亲关系的语言或方言的发展过程中,某些地区的语言变异,往往与语言接触有关。语言使用状况复杂,为语言接触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产生语言接触现象成为必然,只是目前这一研究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探索突厥语族语言接触状况是有现实意义的。

三、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的定位

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新疆语言接触都是非常频繁的,只是有些接触比较隐秘,不易察觉,而有些接触却比较明显,引人注目。游汝杰、邹嘉彦认为,“语言接触大致有四种结果:一是语言的同化;二是语言的借用,以词汇的输入和输出为主;三是语言的融合,即产生洋泾浜语和混合语;四是双语现象的产生。”^[8]据我们考察,这四种语言接触现象在新疆突厥语族诸语言接触中都存在,只是程度的轻重和接触的形式不同而已。

语言接触后的同化是指某一民族语言的使用者由于种种原因放弃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转而使用另一种语言的行为。新疆是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特别是各自治州县中语言同化现象更为常见。据我们了解新疆突厥语族诸语言接触后的同化现象主要发生在个体言语行为中。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明确规定了我国少数民族有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但同时规定少数民族可以直接学习和使用全国通用文字。这说明我国少数民族有自由选择使用何种语言文字的权利,每个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自身需求加以选择。居住在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其他民族的居民,有些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自愿送自己的孩子上维吾尔语学校,维吾尔语成为这些人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交际的语言,这就是语言的自觉转用。同样散居在哈萨克聚居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也可能自愿接受哈萨克语的教育,哈萨克语成为下一代人学习和使用的语言。这种自觉的语言转用行为在新疆普遍存在,既存在于各突厥语族语言之间,也存在于其他类型的语言之间,总的趋势是使用低层语言的人群更易转而使用高层语言。

新疆同时还存在突厥语族诸语言接触后的集团语言同化现象,我们常依据一个群体掌握当地语言的总体状况来判断其被同化的程度。据高莉琴研究,“乌孜别克族,在家庭内部使用本民族语言,在其它交际场合转用或兼用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达斡尔族、塔塔尔族人口较少,从语言功能上说已经降格为族内或家庭内部交际语言,社会功能萎缩,家庭以外的交际选择其它语言。”“撒拉族,本民族语言缺乏社会交际功能,与汉民族杂居的撒拉人,多使用汉语;与维吾尔族杂居的撒拉人,多使用维吾尔语。宗教活动使用阿拉伯语。”“图瓦人由于他们一部分人与蒙古族杂居,一部分与哈萨克族人杂居,所以他们中一部分人兼通蒙古语,一部分兼通哈萨克语。在族群内部、家庭内部使用图瓦话。”^[9]她最终得出新疆趋于濒危的突厥语言是塔塔尔语,这与塔塔尔语使用的人口少、范围小、功能弱有密切关系。由此可见,新疆突厥语族诸语言间的集团语言转用和兼用现象也是很普遍的,近年这种集团语言同化现象有加剧的趋势,这会导致某些突厥语族语言日趋濒危,这种现象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语言接触后的借用主要是指词汇的借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借词。不同语言相互接触后不论是个人的直接接触,还是通过传媒的群体性接触,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词汇的相互借用,因为词汇是语言中最易变化、最易渗透的语言要素。据学者们研究,突厥语族语言的借词主要来自阿拉伯语、波斯语、俄语和汉语,突厥语族语言之间的词语借用常常是某一突厥语言先从外族语中借用,另一突厥语言受到影响再从这种语言中转借。白斯木汗·浩斯别克对哈萨克语中阿拉伯—波斯语借词的借用途径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阿拉伯—波斯语借词是从14—15世纪开始通过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等民族的书面语和口头传入哈萨克语的。因为哈萨克人和阿拉伯人或哈萨克人和波斯人从未发生过直接来往。随着阿拉伯的影响扩大,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在15世纪,哈萨克人就放弃了回鹘文并接收利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老文字。阿拉伯字母的借用,为吸收该语言的词创造了条件。”^[10]这一实例再次证明新疆突厥语族语言常通过转借的方式接收外来词,这种借来借去的方式密切了突厥语族语言的关系,因此突厥语族语言之间存“共同词”的现象。学者们早就发现维吾尔语中存在与突厥语、蒙古语共有的词汇,在现代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锡伯语中也存在不少相同或相似的词汇。祖菲亚·玉努斯认为“这些词,在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撒拉语、裕固语等属突厥语族的诸语言中都表达相同的含义,只是在读音上依据不同民族在语言上的发音习惯多少有一点变异。在维吾尔语和蒙语中也存在有许多共同语。这是因为,维吾尔族与蒙古族相互杂居,且联系密切。因此,民族间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有语言相互融合的情况也不足为奇。”^[11]这有力地证

明了语言接触越持久、越强烈,相邻语言中的共同成分和在所有语言平面上的共同现象就越多。各突厥语族语言在发展的进程中通过不断地相互吸收而使本民族的语言更加丰富。

两种语言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互相接触,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产生洋泾浜语和混合语。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聚居的地区,人们为了互相沟通,语言接触频繁,互相借用对方的语言成分,语音、词语或语法成分混合,结果会形成不同于各自语言的结构成分,这就是混合语。据我们观察,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这里居住着哈萨克、维吾尔、汉、回、蒙等十几个民族,除汉族外,哈萨克族是这里的主要民族,其居住历史悠久,人口数量最多,哈萨克语是这里的主要通用语。当地维吾尔族居民除了使用维吾尔语之外,大多会说哈萨克语,这种双语情况引起了当地维吾尔语变异,变异涉及到语音、词汇等要素,体现出多层面、多角度的特点。分析额敏维吾尔语的变异情况,我们发现目前的变异主要显现在语音的变化上。音位交替现象实际上就是一种同化,说明额敏维吾尔语的语音与哈萨克语语音在混合。另外,额敏维吾尔语中已有大量的哈萨克语词汇成分存在,已出现词语混用的现象,这是形成混合语的基础。混合语是在两种语言交融下产生的第三种语言,从严格意义上讲,额敏维吾尔语的发展相对较稳定,还没有形成一种真正的语言,只是有慢慢接近并向哈萨克语靠拢的趋势,短期内形成一种混合语是不现实的。这种现象既不同于方言,也不同于混合语,更像是向混合语发展的一种中间过渡状态,我们姑且把它看作是混合语现象。维吾尔语在新疆是高层强势语言,其标准语的推广巩固了维吾尔语的强势地位。维吾尔语在额敏却处于弱势语言地位,但仍然受其强势地位的影响,哈萨克语对维吾尔语的影响是有限的,特别是对现代书面语影响微弱,它的影响更多地反映在口语当中。社会交谈者努力进行互比以使彼此都使用交谈者语言的词语,这是从古代保留下来的一种交际心理,额敏维吾尔语就是在这一交际心理的驱使下日趋混合。

双语现象是指个人或语言社团在各种不同环境条件下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口头表达或交流思想的语言现象。新疆各民族长期杂居,语言接触历史悠久。由于突厥语族各民族语言相当接近,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以及乌孜别克族在日常交际中均不会产生太大的障碍,双语现象是很普遍的。杂居区的居民通常既会说本民族语,也会说杂居区的民族通用语,他们往往因场景不同选择不同的语言。新疆维吾尔语、汉语、哈萨克语使用人口多、范围广,语言地位稳定,逐步成为各级社会交际场合中的强势语。其他弱势突厥语族语言使用人口减少,受强势语言影响较深,语言的社会功能渐渐趋弱。年轻一代中,能懂得和使用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人越来越少,而且他们对继续学习和使用这些民族语言的愿望趋淡,呈现出向强势语言转用的单语化趋势。

底层语言理论认为语言在互相接触中竞争,其结果导致语言地位的层级性,战胜的语言是上层语言,战败的语言是底层语言。事实上语言之间的接触和影响并不都是你死我活的,越来越多的语言自愿转用的事实反映出语言使用者平和宽容的民族心态。学习和接受其他民族语,使本民族语言更加丰富优美,更具表现力成为一种趋势。新疆是一个语言接触强烈的区域,语言接触形式多样,语言的兼用、转用、混合、竞争成为语言接触的必然结果,也成为各民族友好往来的见证。

四、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的演变规律

突厥语族语言是典型的粘着语,按语言结构类型来划分属SOV型语言。基于语言间的亲属关系,各突厥语族语言之间存在为数众多的共同成分和特征。语音系统中有许多相近的特征和较为严整的成系统的对应规律,词汇上存在大量的同源词和语言成分,语法上有相似的语法结构和一致的语序,因此突厥语族语言的接触不论就强烈性而言,还是就持续性而言有其特殊性。审视新疆突厥族语言接触状况,我们认为有如下规律:

1. 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后总体演变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趋同。梅耶就曾指出:“语言是用来当一个社会的成员之间的交际工具的,为了适应它的这个用途,并且因为社会集团都有要求它的成员完全一致的正常趋势,所以每个社会集团的语言都逐渐趋向统一。”^[12]黄行在《语言接触与语言区域性特征》一

文中也探讨了语言接触后的趋同性,他认为“甘肃、青海、川西、藏东、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海南等省区的多种语言交错分布地区会发生因语言接触而产生的变异现象,某些系属和类型迥异的语言之间已经不同程度地发生结构趋同,甚至语言混合现象。”^[13]事实证明,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后显现的趋同性表现在各个层面。从语音层面观察,最容易发生变异的是两种语言在语音上有对应关系的音位,存在音位交替现象。按照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来看,语音变化影响到语音系统时其表现必然为词汇扩散,词汇扩散的结果就是使施惠语与受惠语日趋接近。从词汇层面观察,主要表现在词汇的借用上,借词常常同源或同语族转借。

2. 突厥语族语言接触的结果受语言功能的层级性影响。威望较高、层级较高的语言是强势语言,影响大;威望较低、层级较低的语言是弱势语言,影响小。但在某一具体区域又有所不同,可能形成逆势影响。比如维吾尔语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高层语言,威望高,影响大。柯尔克孜语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通用语言,是当地的强势语言,威望高,但层级低,高层级的维吾尔语在当地受到逆势影响。

3. 突厥语族语言接触中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影响起决定作用。其一表现在对语言结构的影响上。假如强势语言中存在某种弱势语言中不存在的成分,两种语言接触后这个成分就成为语言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容易发生变异。语言接触后出现的增音现象,增加的常常是强势语言中特有的语音成分。其二表现在对社会功能的影响上。突厥语族诸语言中强势语言的地位稳定,使用人口多、范围广,弱势语言受强势语言影响,语言的社会功能日趋减弱,弱势语言群体中的语言自愿转用现象较为普遍,总的趋势是使用弱势语言的人群更易转而使用强势语言。

4. 突厥语族语言接触最明显最直接的结果是词汇的借用。词汇的借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借用施惠语中原有的词语,这些词语往往是使用频率高的日常生活用语;另一种是一种突厥语先从外族语中借词,另一突厥语再从这种语言中转借。

5. 突厥语族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异会由浅入深发展,从局部变异开始,发展成系统变异,再由系统变异转变为语言混合。混合语现象会维系一定时期,但随着强势语言的日趋增强,可能会使其中的一种语言更接近或完全融入另一语言中,语言替换是语言发展的最终趋势,但是语言兼用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下去。

语言接触是动态的,它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活语言是语言动态性最有效的证明。语言接触后造成活语言构造的逐渐变化是语言生命的一部分,发现并探讨这一语言现象对探索语言的演变有重要的意义。新疆是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交汇地,各民族人民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语言接触增强了各民族间的联系,这不仅丰富了各民族的语言,而且有利于各族人民团结。但是我们也看到,突厥语族各语言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趋势,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洪勇明. 论语言影响的若干规律——以新疆语言接触为例[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7 (3): 132.
- [2] 刘宏宇.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语言使用情况比较研究——语言接触与语言转用[J]. 满语研究, 2007 (2): 48.
- [3] K·M·穆沙耶夫. 突厥语和世界其它语言接触[J]. 舒平译. 西北民族研究, 1993 (1): 265.
- [4] 艾尔肯·肉孜. 现代维吾尔语阿图什方言研究[J].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2003 (1): 62-63.
- [5] 安成山. 哈萨克语对锡伯语的影响[J]. 语言与翻译, 1997 (2): 17.
- [6] 李树辉. 维吾尔语独特语音现象成因探析[J]. 语言与翻译, 2008 (2): 3.
- [7] 王希杰. 语言接触和语言的演变及其规律——兼评《新疆的语言状况及推广普通话方略研究》[J]. 语言与翻译, 2007 (4): 71.
- [8] 游汝杰, 邹嘉彦. 社会语言学教程[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195.
- [9] 高莉琴. 新疆濒危语言研究[J]. 语言与翻译, 2006 (3): 10.
- [10] 白斯木汗·浩斯别克. 试论现代哈萨克语借词及其方式[J].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1997 (1): 53.
- [11] 祖菲亚·玉努斯. 浅论维吾尔语中借词的出现及其对维吾尔语所产生的影响[J]. 新疆教育学院学报, 2000 (3): 74.
- [12] 梅耶. 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8: 86.
- [13] 黄行. 语言接触与语言区域性特征[J]. 民族语文, 2005 (3): 11.

(责任编辑 张瑞珊 责任校对 戴正)